

热历史

古代也有“志愿者”

志愿者,自古有之,只是中外、古今的称谓有所不同,但都是指自愿贡献时间和精力,不计名利与得失,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的人。我国古代对志愿者有“善者”“善人”“仁者”“侠士”“义士”之称,近现代多称之为“慈善家”“义工”“志愿者”等。

志愿者古称善、仁、侠、义

志愿服务起源于19世纪初西方国家宗教性的慈善服务,而“志愿者”一词来源于拉丁文,意为“意愿”。其实我国古代早已有“志愿”一词。东晋王羲之《与谢万书》曰:“老夫志愿,尽于此也”;金代王若虚曾言:“诚得终老此山,志愿毕矣”(《金史·王若虚传》),这其中的“志愿”便是志向、意愿的意思,后引申为自愿。

尽管我国古代没有“志愿者”一词,但“志愿服务”理念则存在了上千年。

早在先秦时期,儒家孔子和孟子便倡导“仁爱”和“仁术”,而墨子则主张“兼爱”,提倡“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乐书论》更是明确倡导:“闻征音,使人乐善而好施”。由此,历代将“乐善好施”“公义当先”“仁爱为民”视为一种美德,受到广泛推崇。尤其是在大灾大难之时,以扶危济困、安老救孤、赈灾施医之援助,践行慈善、仁义之厚德,史籍中便记载了许多历代“志愿者”的善举。

我国古代多将“志愿者”称为“善者”“善人”“仁者”“侠士”“义士”,而近现代一般称“慈善家”“义工”“志愿者”等。古今对于“志愿者”的称呼虽有不同,其精神内涵却是一致的。

史海钩沉

马的驯化与改良

自古以来,马都是人类生活的伙伴。它以其忠诚、勤勉与灵性等特征,陪伴帮助着人们。在那遥远的《诗经》时代,马就桀触着人类情感,开启了诗意空间。

“戎车既驾,四牡业业”,感激马对战士征途的助力;“执轡如组,两骖如舞”,尽显彬彬君子的优雅风姿;“陟彼高冈,我马玄黄”,诉说女子对爱人的思念;“皎皎白驹,食我场苗”,表达对隐士的倾慕与挽留。

马被人类驯化大概可追溯到5500年之前,最早是在位于今哈萨克斯坦的柏台遗址发现了马骨和马骨制作的渔叉,之后家马和养马技术向东和向西传播到其他地区。

我国最早的家马出现在黄河上游地区,位于今甘肃省永靖县的齐家文化大何庄遗址、永靖县莲花乡的齐家文化秦魏家遗址皆发现了随葬的马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发掘了多个车马坑,可确知商代晚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存在家马。

汉武帝时期,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后,乌孙王遣使给武帝献上良马数十匹,汉武帝将之命名为“天马”。同时,张骞也带来了西域大宛国(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

“善者”是对品行善良,乐于行善、施善之人的尊称,俗称“善人”“大善人”。善者多施善于乡里民间的贫者、弱者、残疾者,或在灾难发生时赈灾救济,也有出资修桥、筑路、掘井及建庙宇者。

“仁者”源自儒家观念,是对品德高尚、积德行善之人的尊称。孟子曰:“仁者爱人”,即充满慈爱之心,满怀爱意的人。历代各阶层“仁者”颇多。

“侠士”指义薄云天之人,勇于救助困、济贫赈灾之士。“侠”,即兼爱天下,惩恶扬善。“士”,即仁爱世人,舍生取义。

“义士”指守义不苟或品行超凡、乐于出财布施、慷慨乐助的人。清代翟灏《通俗编·释道》释汉《曹全碑》碑文曰:“义士盖但出财之人。今人出财布施皆曰信士。宋太宗朝避御名,凡义字皆改为信。”

“慈善家”是近现代对热心公益,经常参与慈善活动,并有突出贡献的人的尊称。他们愿意把自己所有的个人资源与社会上需要的人分享,且受到广泛赞誉。

“义工”,是对自愿贡献自己的时间、精力、技能,无偿参与社会服务的人或群体的称谓。多义务服务于弱势群体,如孤寡老人、残障人士等。

修桥开厂结善缘

海淀中关村西区有一条善缘街,西起彩和坊路,东北至北四环路,因历史上有善缘桥得名,而善缘桥又因褒奖一位老居士的善举得名。

坊间盛传,道光年间,海淀镇东部有一条泄洪渠道,每至雨季水流不断,为人们出行带来诸多不便。镇上住着一位80多岁严姓广化寺居士,以卖画为生。他见镇上的人们雨季出行不便,就拿出所有的积蓄,

在泄洪渠道上修建了一座石桥。桥为东西走向,东西两侧用花岗岩垒砌桥墩,然后横架四块约一丈五尺的长石板,原本要设置护栏板,但桥面修完了,老居士的积蓄就用光了。居住于此的乡邻被老居士的善举所感动,便集资设置了桥的护栏板。因此桥为礼佛老居士倾资而建,故将此桥称为“善缘桥”,既取佛教术语“善法为佛道之缘者”,也有广结善缘、多行善事之意。该桥使用了许多年,后因疏通水道及修建街巷而废弃,但将石桥曾在的胡同称为“善缘桥胡同”。2000年建设中关村西区时,该胡同被拆除,后在胡同大致走向新修建了一条街道,遂称“善缘街”。

据《北京灾害史》记载:光绪十六年(1890年)五月二十日以后,京城忽降大雨,并连降多日。汾庄在卢沟桥东南,水灾尤为严重。巡城御史张廷燎(字光宇,河南舞阳人)在巡视中,见水患导致流离失所灾民众多,便从家中拿出钱款,与普善会一起在此设立义厂放粥。因“以其简便易行,且急救命也”,“每日一勺之粥实能活一人一日之命”。不久又在辛庄子神庙设立西厂放粥,由九月初至次年四月始行止厂。同时在广渠门外关帝庙再设一东厂,办理义厂放粥,专济东安(今属河北廊坊)、武清(今属天津)等处难民。由九月初开厂至次年四月二麦登场止厂。由于灾民众多,粥厂开设时间较长,他倾尽了家中的所有积蓄,还向亲朋好友借银达千两。

张廷燎之善举为灾民所称道,称其为“张大善人”。顺天府尹闻其善举,上奏朝廷请以旌表。光绪皇帝感念张廷燎倾心赈济灾民,赐其匾额,御题“济世良臣”四个大字。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张廷燎调任广西布政使,因他为官清正,多有善举,上门相送者众多。

(《北京晚报》)

人执驱校尉,备破宛掇取其善马云。”《汉书·李广利传》中有同样的记述,颜师古注:“习犹便也。一人为执马校尉,一人为驱马校尉。”体现汉武帝远征战略的目的是“破宛掇取其善马”。汉军击破大宛贰师城,得到大宛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雌雄马三千余匹进献汉武帝。至此,骠壮健美的大宛国“汗血马”被命名为“天马”,而乌孙马改名为“西极”马。

大宛天马的引入,带来马种的改良,使之由中原本土的粗短矮小马变为高头大马。这有利于骑兵部队军马的选用与训练,对于汉王朝军力的增强有重要意义。另外,天马还具有精神信仰的意义。

日常生活中,马的主要功能是作为交通工具。它既可当坐骑,又能承担各式马车的牵引力职责。

马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作为狩猎的坐骑。司马相如《子虚赋》云:“蹇蛩蛩,踠距虚,轶野马,轹陶駉。乘遗风,射游騊……倏眴倩漙,雷动焱至,星流霆击。”描写狩猎时车马疾驰、猎兽如风的壮观场面,这里的“马”既是坐骑,也是被追逐的对象,共同构成了动态的、充满力量感的狩猎图景。

(《解放日报》)

生活史

古人狩猎出行

以捕杀动物作为食物的狩猎活动,在人类活动初期就有。随着社会的发展,狩猎活动不再仅仅是获取生存必需品的一项劳动,也是强健体魄、愉悦身心、培养勇武精神的一种活动。西周时期,狩猎作为礼仪的一项内容被正式确定下来。

到了唐朝,狩猎仍然保持着礼制、军训和娱乐兼顾的目的。据史料记载,唐朝不少的皇帝喜好狩猎。《新唐书》记载唐高祖李渊参加狩猎活动的次数就有数十次,有时一年之内狩猎两三次。唐太宗李世民从当皇帝开始,几乎每年都出去狩猎,狩猎的地方遍及全国。章怀太子李贤无疑也是喜好狩猎的。

唐朝的狩猎活动,具有十分明显的军事训练方面的性质。根据《新唐书》的记载,唐朝的狩猎活动从围场选择、时间安排、军阵行列、出猎方向,到驱兽、围捕、射猎,都有严格的规定和周密的组织,分工也很明确,有一部分骑兵是负责“驱逆”的,就是将猎物往一个方向驱赶,如此下来,一场狩猎活动等同于一场小规模军事行动,具有很好的练兵效果。

狩猎之前,还要有充分的物质准备。《新唐书》记载,唐朝设有雕坊、鹞坊、鷂坊、鹰坊和狗坊。雕、鹞、鷂、鹰都是一些猛禽,可以用来狩猎。至于猎犬,因其嗅觉敏锐,也成为打猎的“标配”,它们较多地出现在唐代壁画中。

(《陕西日报》)

李清照的风骨

李清照不仅是我国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女作家,同时也是一位茶道专家、分茶好手,她的以茶博戏实开茶令之先河。

李清照的词婉约中藏着风骨,清新中不失豪迈,这豪迈之气甚至可以跟岳飞《满江红》透露出的壮烈相媲美。

李清照多才多艺,一生写诗、填词、绘画、收藏金石字画。李清照特殊的经历和视野,在那动荡艰难的日子里,她的诗词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特别是诗词中表现出的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和家国情怀,极大丰富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内容,也奠定了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这些更体现在她早年创作的《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二首》中。李清照在这两首诗中深刻分析了唐朝为什么会发生安史之乱,其中一句“夏商有鉴当深戒,简策汗青今俱在”,写出了她对北宋王朝危机深深的担忧,提醒统治者要引以为戒。李清照在这两首诗中所表现出的爱国精神,在其他诗词中也有所体现。1133年夏天,当李清照得知大臣韩肖胄和胡松年要出使金国时,写下“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青州一抔土”,表达了无数失去故土、远离家乡的百姓心中的强烈愿望。

(《河北日报》)